



科学认识我国粮食安全

刘合光 秦富

(一)

在全球经济社会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审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不能脱离全球环境。总的来看,我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全球环境是不安定的。

首先,解析近年来国际上粮食价格高涨的起因,除了长期积累的供需基本面因素外,气候因素、金融资本和信息操纵因素冲击国际粮食市场,导致全球粮食危机在短期内凸显。

其次,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约束,决定全球长期存在巨大的粮食安全压力。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新增23亿,仅此一项就需要全球粮食供应量增加70%。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对动物源性食品需求强劲增长,继而畜牧业的强劲增长会持续到21世纪中叶之后,这就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巨大。此外,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人口压力下,加强了生态系统对粮食生产服务的利用力度,所导致的土地荒漠化、淡水资源耗尽等,已经严重制约全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总之,全球粮食供求难以长期平衡,粮食安全存在长期压力。

再次,国际粮食市场与资源调控能力建设进展缓慢,不利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防与治理。特别是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粮食供求状况、国际贸易角色、地缘政治利益及国家发展方针与战略重点不同,在面对全球价格急剧变动时,很难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容易加剧全球粮食市场的供求矛盾。因此,为避免全球粮食危机出现,迫切需要加速构建全球协调一致的危机预防与治理机制,有效调控全球粮食市场与资源。

(二)

全球环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不可预知的不确定性影响,极端气候有在我国和其他主产国内同时发生的概率,届时我国粮食国内短缺而且国际市场短缺同时发生,我国将面临最大的粮食危机;二是国际粮食价格暴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传导,已有研究指出国际粮价波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传导到国内,这会拉升国内通货膨胀指数,影响居民生活消费;三是国际粮价暴涨抑制中国饲料粮进口,影响我国畜牧业发展,导致畜产品供给减少甚至短缺;四是全球粮食价格暴涨导致粮食生产所需投入品价格上涨,影响我国粮食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导致农民比较利益下降;五是存在全球资本在我国境内冲击粮食产品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环境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程度并不会很大。就以上几大影响途径分析,这些影响发生的概率很小或者影响程度确实有限。比如,发生全球大范围极端气候灾害的概率很小。再如,国际粮食价格暴涨的价格传导只影响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走势,但是波动不会同幅度,毕竟我国粮食储备水平比国际安全水平高出一倍,而且我国国内粮食供给比较稳定。此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国家给予粮食直补的情况下影响幅度有限;国际资本垄断我国粮食产业的可能性很微弱,不值得过分担忧,等等。

分析起来,我国粮食安全主要由内因决定。如,我国长期坚持的保护耕地基本国策,缓解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土地资源约束;我国长期坚持的高库存粮食储备政策,有效避免了粮食价格暴涨暴跌和粮食危机;建国以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有效解决了粮食的流通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程有效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居民具备足够的收入解决家庭粮食安全。在这些前期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我国粮食生产的科技水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农的生产积极性。科技水平决定了未来我国在耕地面积不再增长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下,能否产出更多的粮食以满足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的粮食需求增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决定了在粮食播种面积不变甚至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以确保农业资源是否可以得到可持续利用,农业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能否得到提高,从而决定粮食产量能否得到提高。粮农生产积极性是决定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供给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近年来,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稳定提高,确实调动了农业生产者积极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

(三)

应对全球环境的不确定性,要立足国内解决我国粮食安全,合理、有序、高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同时我国要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为解决我国粮食安全创造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立足国内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内因是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导因素,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根本。必须依靠国内生产确保可以满足100%口粮需求,90%以上的全部粮食需求;全面保护耕地,守住农田,力争到2020年建设好10亿亩高标准农田,提升农田质量,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依靠科技培育粮食良种,优化栽培技术,提高粮食单产;扶持优势粮食产区,培育种粮大户,激励农户种粮积极性,从而从内因上有效解决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其次,面向国际市场调剂粮食品种余缺。要统筹国内外粮食市场,通过国际贸易适度调剂粮食丰歉和品种,以有效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统筹利用国际国内粮食生产资源,积极实施粮食“走出去”战略,实施负责任的农业投资,积极在东道国传播粮食生产技术,有效协助东道国解决粮食安全。

再次,积极参与治理和完善全球粮食安全环境。一要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全球粮食安全相关协议和制度的起草、讨论和制定,实现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的有序治理;二要积极参与建立全球粮食资源与市场调控机制,确保各国在粮食危机预防和应对政策措施方面保持一致。

(作者单位: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所)

本版编辑 赵登华

加快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为基于生产成本优势的价格竞争力,成本优势又是建立在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较低的基础上。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减弱。特别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更加注重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必然要求进一步理顺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基本要素价格。由此决定了国内要素价格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未来再依靠传统要素价格优势开展国际竞争将难以维系。

从国际环境看,目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整体上仍处于弱复苏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诸多压力。一方面,为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抢占战略制高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科技新战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模式,打造全球产业和经济增长的龙头,再造国际分工新格局,我国企业和产业面临

新一轮的分工和竞争压力。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具有相似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产业的错位竞争、实现互利共赢,也是未来外贸转型发展需要研究的课题。这些国际竞争压力的加大直接反映为贸易摩擦的频发。

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我们亟须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提升为基础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还要看到,虽然目前我国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但同时企业的研发和设计能力、

资本运作和市场营销能力都在逐步增强,出口产业综合发展潜力仍然存在,技术更新不断深化,新兴产业迅速发展,知识产权战略逐步推进,都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我们要进一步推动企业出口从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转化,继续完善贸易、产业、财税、金融、知识产权政策,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自我转型的内在动力,为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跨越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华音)

比较优势在变化 出口战略需调整

隆国强

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某种商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另一种商品,从而可以专注于生产并出口具有更低机会成本的产品而参与国际分工。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还比贸易伙伴具有更低的成本,则该国在该产品具有绝对优势。传统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资源禀赋。但观察各国贸易结构的变化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比较优势处于演变之中。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成为大的出口国。在此过程中,我国的比较优势也

未来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要求我们趋利避害,调整外贸发展战略。

出口战略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环境日趋严峻。贸易摩擦从以发达国家为主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一些国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产能过剩更加严重,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以低成本取胜的出口战略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经营环境。第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来自发展中国家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与以往相比,出口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华转移已经大大减速,甚至出现了转向,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将企业转移到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学习东亚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成功经验,开始进入劳动密集型产

我国正在进入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时期,基于传统劳动力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出口优势正面临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严峻的挑战。为此,我国应该实行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出口升级战略,通过主动的调整与引导,构建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的最大制约因素,是技术瓶颈突破难度大。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出口升级战略,需要完成以下战略重点任务:

第一,构建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一是牢固树立制造业立国的理念。欧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始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对于我国而言,制造业更是在全球竞争中立足的根本,必须在全社会重新树立高度重视实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观念。二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

我国比较优势及影响因素发生改变

一直在发生变化,从开放初期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变成主要出口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强劲,近年来一些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也逐渐赢得了国际竞争力,如移动通信设备等。

还必须看到,目前支撑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的基本因素正在发生重大改变。与以往相比,劳动力供给已变成了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普

通工人供给出现了“招工难”和工资快速上涨现象。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展望未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普通工人工资将加速上升。这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优势正在显现,如规模迅速扩张、需求结构快速升级的国内市场,教育程度大幅提高的人力资源,完备的产业

配套能力,不断增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完善的基础设施,日见增强的对外投资能力等。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投资环境具有较为明显的综合优势。未来,更多的企业将把中国定位为重要的市场和研发基地。这种变化有利于推动我国比较优势从低成本的劳动密集产品向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升级。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需要从以往的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出口战略转向动态比较优势出口战略,主动构建有利于出口结构升级的环境条件,增强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我国出口战略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

业的国际市场,在我国具有传统优势的领域展开竞争。从数据分析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初级产品、资源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恶化,低技术制成品的竞争优势相对减弱,中技术制成品竞争优势明显增加。第三,出口结构升级可能遭遇发达国家的打压。目前为止,我国与发达国家总体上是互补性的分工关系,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产品升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正面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中国的追赶,美国可能在贸易保护、市场开放、汇率、知识产权、劳动与环境标准等多个领域发难,遏制我国出口结构升级。

出口升级面临的三大机遇:一是“引进来”加速技术进步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一枝独秀,市场前景更加诱人,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对华战略,向中国加速转移先进制造活动、区域总部、研发和生产性服务活动,全球人才也出现了向我国加速流动的新趋势。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低迷,美国等发达国家放松高技术进口管制,制成品价格回落,我国进口先进技术机会更多、成本更低。这有利于我国提高“引进来”的质量与水平,加速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二是“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的战略机遇。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企业出现了资金链紧张的压力,经济复苏迟缓,企业市场价值低估。与此

同时,我国外汇充裕,企业盈利状况良好,国际化经营的动力与能力日益增强。我国企业可以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通过对外投资并购,获取境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这将大大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化经营水平,提高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三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向新兴市场出口的机遇。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我国资本技术密集的产品技术水平还会略低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但价格更低,性价比具有优势,这一特性决定了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尽管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但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其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将对我国生产的产品产生强劲需求,如电力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移动通信设备等。

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出口升级战略

学、研合作的有效机制。三是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五是探索多种多样的有利于促进研发及其产业化的新机制,如新技术孵化器、留学生创业园、风险投资基金、技术交易市场、产业技术联盟等。

第二,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行开放发展战略。虽然对幼稚产业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后起国家的产业升级,但过度或过长时间的保护不仅令企业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形成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我国必须调整目前对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有序降低贸易保护,打破垄断,大力鼓励平等竞争,关

键是要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

第三,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依靠低成本竞争的战略下,中小企业是出口主体。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大企业是主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分摊研发成本和品牌成本,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一方面,要大力改革国有大型企业,增强其创新动力,将其改造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要改革行业准入制度,大力支持民营企业进入资本技术密集产业,扶持其开展国际化经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第四,提升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发展基础条件。改革教育体制,按照市场需求培

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才。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着力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培育一大批技能型的产业工人。加大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投入,力争尽早突破技术瓶颈。

第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以成套设备为重点,加大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扶持力度。综合利用外交、工程承包等多种手段,加大资本技术密集产品的出口促进力度,大力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并逐渐向发达市场渗透。

第六,以加工贸易上游料件的进口替代为突破口。加工贸易上游料件大部分是资本技术密集的中间产品,从加工贸易料件进口替代入手,可以充分利用发挥下游加工环节在华的独特优势,实现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间产品的“借船出海”。

体制创新激发人才创造力

曹阳波

人才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近年来,各地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大胆探索,推进人才工作机制制创新,不断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例如,有的大城市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代理式”、“一站式”服务,派出专员办理医疗、住房等服务问题;有的地方颁布科技新政,给科技人员创业“松绑”,力推科技人员走出“围墙”创新创业;还有城市的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推进实施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等重大政策试点;等等。这些探索,对于解决制约人才发挥作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才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推进人才发展政策创新,以政策创新带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完善我国人才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举措。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应搞好顶层设计。要站在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创新人才政策,增强政策制定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制定和落实政策过程中,既要注意人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又要注意与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相配套,与科技、教育重大改革举措和相关政策相衔接,不断提高人才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水平。其次,要围绕各类人才和各地各部门反映强烈的问题推进创新。把解决现实矛盾和突出问题作为政策创新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善于运用市场手段配置人才资源,促进人才科学有序流动,并拓宽人才评价发现的途径。此外,还要更加重视人才的激励保障,制定鼓励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办法,完善高技能人才津贴和奖励制度,制定出台更加灵活、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多方入手破解农村环保难

唐锐

最近,关于红旗渠源头发现大量生活垃圾的新闻报道引发了热议。曾经的“人工天河”,而今却变成了周围几个村子的“垃圾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农村环保问题的关注。

红旗渠源头出现垃圾仅是农村垃圾污染日益严重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因环保意识差、治理不力等原因,农村环境污染程度甚至超过了城市。有数据显示,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2.8亿吨,生活污水约90多亿吨,绝大多数没有处理,随意排放;每年产生的6.5亿吨各类农作物秸秆有20%未综合利用,被焚烧或堆积于河湖沟渠、道路两侧;眼下农村的污染排放已占到全国污染排放的“半壁江山”。一面是污染不断加剧,另一面却是治理遥遥无期。据统计,全国60万个行政村

中仅有少部分开展了污染治理,大多数行政村还缺乏必要的环保设施,这使得农村生态环境陷入不断恶化的怪圈。

曾经蓝天白云的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却被蒙上挥之难去的污染阴霾,实在令人痛心,也令人警醒。没有农村的山清水秀,何来真正的美丽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有效地防治农村污染,生态文明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要想真正切实破解农村环保难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相关部门要按照城市环保工作的经验,从加大环保投入、推进法规出台、设立管理机构、健全标准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对农村环保工作作出全方位的部署安排,加强综合治理;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开展农村环保宣传教育,建立多种形式农村环保公众参与机制,特别要提升农民环保意识,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环保的主力军。

